

程超 主编  
魏皓奔

# 浙江 文革 纪事

1966·5—1976·10

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浙江方志》编辑部

# 浙江“文革”纪事

(1966.5—1976.10)

程 超 魏皓奔 主编

《浙江方志》编辑部

1989年2月

顾 问

罗晴涛

乐子型

魏 桥

主 编

程 超

魏皓奔

## 前 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本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自1986年下半年起，组织力量，查阅了大量报刊、档案，收集了许多失散在各地的原始资料，走访了不少老同志，历时二年多，四易其稿，整理出这本《浙江“文革”纪事》。《纪事》目的在于存史，它对我省各地正在编纂地方志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应多方要求，特此刊出。

《纪事》作为内部资料，仅供有关领导、修志单位、教学资料部门参考，并请补充指正。

《浙江方志》编辑部

1989年2月

## 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概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浙江省和全国一样，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严重的灾难和损失。“文革”中，张春桥、吴法宪就直接插手；王洪文遥控指挥；林彪把浙江作为他们武装判乱的固守基地。浙江的局势多次反复，武斗频繁，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66年5月至1968年3月，是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夺权时期，其具体可分为两段。（1）发动阶段。主要事件有：1966年6月初，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6月下旬，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浙大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8月23日开始，全省红卫兵（中学生为主）上街破“四旧”。同年9月15日，省、地（市）一些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开始全面“炮轰”省委。同年11月

下旬，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省委工作基本瘫痪。

（2）夺权阶段。鉴于省委被冲垮后，省军区成为造反派夺权的主要障碍，1966年12月23日深夜，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以抓走资派为名，冲进省军区机关，发表了夺权宣言，要创造夺军权的样板，前后在省军区闹腾达40天之久。12月30日，以张永生（美术学院学生）为头目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后，首先对《浙江日报》进行夺权。当上海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时，浙江造反派积极跟上，但在省级领导中结合谁打倒谁的问题上，造反派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因此有人另拉队伍，成立了“红色暴动委员会”。从此，浙江造反派形成两大派组织——“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长期互相争斗，局势极为混乱。1967年3月15日，中央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组成了以省军区政委龙潜为主任的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春桥、吴法宪为了控制浙江，直接插手，支持和培植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坚决贯彻吴法宪“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的指示，在军管会内部制造分裂，使军管会无法正常工作。同年6月6日，“杭丝联”两派发生武斗，中央召集有关人员到北京会谈，7月4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二十军、空五军他们支左方向路线是正确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中错误是严重的，解决省军区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为解决浙江问题定了调子。8月，正值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以及其它的因素，导至了两个改组——8月22日，中央决定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兼任省军区代政委，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11月中旬，“省联总”在新的军管会支持下，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有省市

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所谓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揭所谓“通敌、资敌、养敌”的罪行，欲置江华于死地。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为筹建省革委会作思想、舆论、组织准备。1968年3月24日成立了以南萍为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的省革命委员会。

第二个时期，从1968年3月到1972年4月，为斗、批、改阶段。主要事件有：批判资敌、通敌、养敌；砸烂公、检、法；批判文艺黑线，迫害文艺工作者；批判“反三红”，镇压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1968年9月中旬开始，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干部和党员遭到迫害。11月初，相继成立省、地（市）“五·七”干校。1970年2月，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又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专案审查的28人，地委书记、厅局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的133人，全省被关押揪斗的人无法统计。有的被打成“土匪村”、“叛徒窝”。1968年11月8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诬陷省军区原领导干部是浙江“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并且要揪后台的后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中央于1969年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即一月会议），讨论解决浙江问题。在康生、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等偏袒下，批评了原省军区几位领导干部，支持了南、陈、熊。张春桥说：“浙江问题的根子在省军区，要解决省军区的问题”，“省军区乱得还不够”。“一月会议”实际上支持了南、陈、熊，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迫害干部和残酷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他们擅自调动部队攻打诸暨和在浙南镇压群众，1969年4月为了各县普遍成立革委会，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南、陈、熊

又下令出动部队在海上追击玉环县群众组织，造成重大流血惨案。1970年4月，陈励耘、南萍为了效忠林彪，决定在西湖南侧风景区为林彪修建行宫（即“704工程”），耗资二千余万元。从1970年起，一些市、县先后建立了新党委。1971年1月召开了省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和进行组织人事安排。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后，查明陈励耘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于9月20日在上海被隔离审查。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揭批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时，从揭发的大量材料中表明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与林彪集团早有勾结和联系。南、熊极力捂盖子，打包票，为自己开脱。1972年3月，中央召集浙江有关军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揭发南萍、熊应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有关问题，下达了（1972）16号文件，同年7月1日，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继续交待问题。

第三个时期，从1972年4月至1975年7月，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批林整风阶段。主要事件有：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同年12月，省委在屏风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揭发陈、南、熊的问题。经过揭发批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平反部分冤假错案，批判极左思潮和派性，解脱和启用部分老干部，浙江省的形势开始有了转机，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1973年1月，王洪文借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帐。支持一些造反派起来活动。（2）批林批孔阶段。党的十大以后，在王洪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煽动下，10月3日，翁森鹤（杭丝联工人，原系红暴派头目，

后投靠了“省联总”）、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给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公开信”上街。同年11月16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打着“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旗号在屏风山安营扎寨，与省委相对抗。他们以办学习班为名，发扬所谓“反潮流”精神，攻击省委主要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排斥打击新生力量，是右倾翻案，右倾回潮等等。实际是翻批林整风的案，妄图重新掌权。1974年1月20日，江青派人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批林批孔的小册子。同年3月，从省委到各地、县和基层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张、翁、贺一伙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3月26日至8月上旬，浙江省召开“三全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会议）。会议主要批判所谓“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批极右，批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为批林整风中处理了的坏人翻案，把大批造反派吸收入党，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充实到领导岗位。同时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使全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洪文遥控指挥，造反派会内会外串连，省委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会议一再延长，开了143天，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浙江形势更加恶化。

第四个时期，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是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贯彻中央（75）16号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派性。1975年6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又派王洪文、纪登奎、陈野萍等带领工作组，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王洪文阳奉阴违，继续插手搞乱浙江，纪登奎同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协助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解决省委领导“软、

散”问题，纠正“双突”，撤销民兵指挥部，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75）16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同时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7月下旬，批判派性，将省、地（市）两派造反派头头骨干200多人集中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翁、贺等人的问题。8月，杭丝联、浙江美院等文化大革命中派性较严重的八个工厂、学校重点进行批派性，搞好团结的教育活动。同年10月，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被下放农村劳动。全省形势又暂时有所好转。（2）“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主要事件有：中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批林批孔受到批判处理的帮派人员又开始串连活动。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草拟了一份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右倾翻案风，批派性、办学习班都是错误的。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三结合领导干部）主持。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大专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参观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后局势又出现了反复。3月下旬，杭州市人民群众开始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4月4日，全省各地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9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赖可可，说浙江的四·四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派公安部负责人祝家耀到浙江，追查“杭州四·四事件”和“总理遗言的制造者”。在全省开展清查活动，拘捕关押干部群众，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党内资产阶级。9月25日，赖可可可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10月21日，全省军民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粉碎“四人帮”。

## 目 录

|            |         |
|------------|---------|
| 1966年..... | ( 1 )   |
| 1967年..... | ( 24 )  |
| 1968年..... | ( 79 )  |
| 1969年..... | ( 117 ) |
| 1970年..... | ( 134 ) |
| 1971年..... | ( 146 ) |
| 1972年..... | ( 156 ) |
| 1973年..... | ( 171 ) |
| 1974年..... | ( 193 ) |
| 1975年..... | ( 231 ) |
| 1976年..... | ( 247 ) |
| 附录.....    | ( 262 ) |
| 后记.....    | ( 273 ) |

# 1966年

## 5月18日至20日

《浙江日报》刊登省委写作班子署名“辛文兵”《〈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三篇文章。

## 5月20日至21日

《浙江日报》连续刊登《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 5月26日至31日

《浙江日报》在“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了全省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浙江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威力最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指路明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们是多大的‘权威’，我们工农兵都要批判它，打倒它，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努力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和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文章。

同日

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的标语和大字报，表示要向“北大七同志”学习，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杭州大学一批师生到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贴大字报，指责省委一些人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路。

6月3日

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大字报，揭发和批判党委对文化大革命制定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问题。

浙江的几所大专院校，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院校党委

和校主要负责人。

温州六中一名教师贴出了温州第一张大字报：《打倒黑帮，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字报提出：“现在黑帮的爪牙伸到了我们市委、省委、大学……，起来战斗吧！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打倒！统统的把他们打倒，彻底的把他们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5日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并制定了八条规定，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据此，浙江省委也抽调机关干部采用派工作组的方式，领导浙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浙江省委要求，省军区第一批抽调二百余名干部（其中团职以上六十名）参加工作组。当时派工作组、联络组的单位有：在杭八所大专院校和《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化局及其所属单位。同时组成了以省委常委陈冰为组长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杭州市委成立文教大队对市属八个剧团以及一些中学派工作组。

6月6日

杭州大学部分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的大字报。于是，《浙江日报》社在三四天中贴出了六七百张矛头指向编委会的大字报，揭发于冠西（社长、总编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月7日

《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这个要点叙述了解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要点分三个部分：（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的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彻底的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10日

《杭州日报》报道，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本市部份五好（六好）职工举行座谈，声讨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谬论。

6月22日

省委作出决定撤销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

6月24日

《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头版刊登《揭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丹的反动面目》一文，报道了省委决定撤销刘丹浙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和副校长的职务，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同时，发表《打倒抗拒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

阶级反动派》的社论。

6月26日

省委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陈伟达、吴宪、赖可可，省委常委龙潜（省军区政委）、王起、陈冰、沈策，浙江省军区负责同志张秀龙、阮贤榜、刘亨云、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辛等，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副书记王子达、关器、李元贞、陈侠、胡景璠、周峰。出席大会的还有各地、市、县委书记，省、市各机关、各单位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党的活动分子一万多人。

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代表省委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江华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一）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二）大胆地积极地参加和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28日

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要求撤走在浙江大学的省委工作组，并要求省委转给中央（省委没有转）。

同日

《杭州日报》刊登，杭州大学学生和教师举行批判大会，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的反党罪行。

7月4日

《浙江日报》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一贯反对毛泽东思

想的林淡秋》的标题下，选登了杭州大学“揭露林淡秋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来是邓拓一类货色”、等文章。

#### 7月6日

《浙江日报》又以《彻底清算林淡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为题，分别选登了杭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二班战斗小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匕首”——评林淡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序言》，杭州大学总务处战斗小组“《说“狠”》是林淡秋资产阶级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语教研组第二战斗小组“林淡秋的黑灵魂”——驳《美好灵魂的塑造者》等文章。

#### 7月14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响应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的倡议，纷纷表示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一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陈腐势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8月1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市军民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会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浙江省军区礼堂进行。

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省委常委沈策，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刘剑，解放军驻浙部队负责人何以祥、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林、张文和、叶泰清，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汤元炳、唐巽泽，杭州市委